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摇摇摇

序摇言

龙渊摇高松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一生创构浩瀚,著作等身,为我们留下丰富而璀璨的精神财富而彪炳于文艺史册;然而,有的作家终其一生,写得不多,留下也少,但就仅有的篇章,却一样给人留下别具艺术风采的印象,而且丰富、充实了艺术宝库,因而长流人间。方令孺当属后者。

—

方令孺,我国现代女诗人、散文家、现代文学教授。1909年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诗礼官宦之

摆

家,属方苞世族后裔。其祖父方宗诚是位著名的宋学家,曾充任过一些官职;父亲方存之谙熟经典诗书,他自命清高,未曾踏入仕途。方令孺生长在如此弥漫着浓郁传统文化氛围的大家庭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接受着古典文化的熏陶,打下坚实的根基。她的父亲崇敬秋瑾等巾帼英杰,喜述有关史迹,给方令孺以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与教育,因此,方令孺自幼培育起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在封建社会里,世宦之家无例外的遵循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男尊女卑,何况幼年丧母,侍奉父兄照看弟妹的职责如同枷锁紧锁脖子,还常遭罹苛斥与责难,一种不堪忍受的压抑时时袭击着她。但她生性倔犟桀骜,因而在其幼小的心灵中埋下反抗的种子,潜存追求自由的渴望。

罪孽深重的旧社会,婚嫁大事对于妇女来说,不仅专横,而且残忍。方令孺也如同千千万万妇女一样,命运无由自主,任凭族长之旨媒妁之言摆布。1920岁便被迫与安徽陈姓官绅之子完婚。但她与其丈夫秉性和志趣的格格不入,“阶级虽同,但又彼此轻视,生活、习惯、思想又彼此矛

盾”，她感到难以忍受的欺凌与窒息。

不久，五四运动如一声春雷，启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页，虽然偏安远居于运动策源地的安徽，但在民主和自由的巨浪激流的震荡下，方令孺也同许许多多被压迫妇女一样开始觉醒，仿佛感受到一阵新春来临的欢欣与愉悦，开始萌发自由与光明的憧憬，热切追求个性解放，决心挣脱痛苦与不幸的桎梏，掌握自己的命运。

于是，~~1920~~1920年方令孺到了美国，先入华盛顿州立大学，继而转往威士康辛大学攻读外国文学专业。这才开始真正接触社会，并逐渐接受西方文化和民主主义思想，而后她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迪，还曾与国家主义右派们开展斗争。

方令孺置身于风云变幻的嬗变之中，虽然对形势的认识和政治观念还处于淡薄与模糊阶段，然而她开始对现实不满，而逐渐发展为封建家族的叛逆，又发展到迈向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以及同情革命和倾向进步的大道。这种经历鲜明地烙着旧中国正直爱国知识分子成长的印记。

去国六载，~~1926~~1926年归国，她“走出故乡，离别

家庭”，决然摒弃过去那种生活，开始独立而又艰难地步入社会，自谋其职，自食其力，决心努力争取“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1934年春方令孺受聘于青岛大学，成为三十年代初期国内为数甚少的几名女大学教师之一。此时，她结识了该校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和外文系主任梁实秋，过从甚密，对她影响颇深。而在她周围往还频繁影响最深的，是其侄儿方玮德和外甥宗白华，以及诗人徐志摩和陈梦家。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经常相聚，徜徉于诗与艺的海洋之中。

大凡文人荟集，总想有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所，徐志摩、闻一多等人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文学圈子，创办了《新月》月刊，人们称之为“新月派”。方令孺与玮德先后加入其中，并由此开始诗歌散文的创作，成为该流派两位主要女诗人之一（另一位是林徽因）。

“九一八”事变的翌年，青岛大学爱国学生激于义愤起来抗议日寇的侵略暴行，方令孺同许多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一样，忧国忧民。加之稻粱谋，一向身体羸弱的她积郁成疾，不得不离开青岛，到北京寄寓姐家治病诊疗，

后又转徙南京养病。其间凡五载,生活的漂泊,病魔的折腾,侄儿的早逝,几乎使她失却对生活的信心。她开始苦闷与彷徨,惧怕接触社会,一度“躲进小楼成一统”,以浪漫主义的幻想废时挨日。这一阶段她创作了许多新诗与散文,是她前期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她企图借文学创作来宣泄苦闷与积郁。这时期的散文有《悼玮德》、《游日杂记》、《琅琊山游记》、《家》等。其作品大抵追求虚妄的自由与美,含有朦胧沉郁的色彩,流露出唯美主义的美学倾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国家和民族存亡危急之秋,烽火震撼着她的心灵,于是一扫过去的忧怨与哀伤,振作而起,思考着自我责任,决心做一个大时代中的新我去引吭一曲新歌,同时亲自送儿女参加抗日队伍,一片报国热忱化作实际行动,去实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的眷眷心愿。

1938年去重庆,受聘于国立编译馆任译员,并兼教职。1940年辞去编译馆之职,专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她热切地追求知识、传授知识,即便“逃难流离之中,……迢迢千里间关入蜀,随

身带着若干册她特别喜爱的书。”(梁实秋《方令孺其人》)这时期方令孺怀着追索进步与真理,紧密靠拢地下党组织,团结在陈望道、洪深等进步教授周围,同情与支持民主斗争,积极声援学生爱国运动,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复旦大学著名的爱国民主教授之一,因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并列入黑名单。

抗日战争胜利后,方令孺随校复员上海。她一如既往地支持民主与进步的斗争,与进步教授共同发表宣言,积极投身于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行列。她热切盼望光明的新生活,所以上海刚解放,便满怀感奋地挥豪写下了《解放前后的一夕》、《一封家书》等散文。在搁笔很久之后,如今在新时代的感召下,用那支彩笔倾诉欢心与高歌,从此她的文学创作展现出崭新的风貌,更由于她的参政,不断的学习与参观,多次的出访异域,使她开阔了视野,拓宽了创作之路,写出热情奔放、意气风发的诗文。解放后的六、七年间,是方令孺文学生涯又一个活跃时期。

1957年方令孺走过了那漫长艰辛的历程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调往杭州,出任浙

江省文联主席，她仍勤于笔耕，自 1935 年至 1957 年，发表的诗文不下数十篇（首），内容深广，感情昂扬，表现出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拳拳的热情，文笔更趋质朴与平实。建国后的几年，方令孺创作喜获丰收，其源盖出于她勤于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故而焕发了青春。巴金在回忆方令孺的文章中写道：“我对她的了解是逐渐加深的。但有一点我的看法始终未变：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随想录·怀念方令孺大姐》）

十年浩劫，方令孺深受迫害，但她信念如磐，爱憎分明，也一如亿万人民为国家前途忧虑，竟至于积郁成疾，1957 年 8 月 10 日溘然长逝于杭州。

但她留下的作品，将恒久不灭。正如巴金所说：“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诗人的纪念永远不会褪色。”（《随想录·怀念方令孺大姐》）

二

方令孺的散文创作发轫于 1934 年。

建国前，成集面世的散文集仅只《信》一种，

方令孺散文选集

选收散文愿篇(1935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近年出版《方令孺散文选集》,收散文解放前所作的愿篇和解放后的愿篇,并附新诗愿首(1935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台湾于近年也曾出版了一册由李又宁、秦贤次选编的《方令孺散文集》,收散文愿篇,新诗源首,译文员篇(台北洪范书店出版)。

方令孺的散文创作横亘现代与当代两个历史时期。就其内容与风格来审视与考察,这两小时期各呈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气与风貌,但其作品的美学品格则还是一脉相承的,渴望光明,憧憬美好,呼唤真情,追求真理,则是她的散文的真正底蕴。

(一)诅咒污浊,改变现实,主宰自我命运,创造一个新的人生。这是方令孺散文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

她曾屡屡疾呼:“~~创造与再创造~~(创造与再创造——笔者注)这两个字,同人的生命是织在一起,少一,都教生命有缺陷。为这思想我常常痛苦,常常同环境起冲突……”(《信》)个人生活与婚姻的不幸,留给她的多是痛苦与辛酸,

离家踏入社会，耳闻目睹的是压迫与污浊，而后战时内地人民惨苦的遭遇，更强烈地触动与震撼她敏感而创伤的心灵，因而在其笔端自然流淌出诅咒与怨懣。如果说，开初这种感情的表达未免过于凄切缠绵，但随着时代巨潮的荡涤，认识与观念的深化，方令孺不再抱着古老的琴，引吭古老的歌，疏忽伟大的时代，要经历一番“涅槃”。她的代表作《信》，是一篇内心独白式的散文，其中寄寓了她这种毁灭旧我，创造新我的心迹：

“我只要毁灭我自己，不留一丝固有的原素存在，然后再生，成为一个原始的，刚强有力的人，不带过往的渣滓，对于一个所谓高雅，神韵，幽深，缥缈，华丽和名贵等等，都不会尝味和醉心，那样才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

表现作者这种心迹的散文，建国后也更呈现出一种新貌，如《一封家书》、《在山阴道上》等等。

即便在山水异域的游记中，也不乏寄寓呼唤变革的心声。如《游日杂记》，作者怀着欣喜的心情，应姊之邀，前往秋光下的扶桑，但上岸后所见的是希特勒式的胡子，警察腰间的日本佩刀，横

滨海关充满了对中国人敌视的气氛，“我真伤心！几天来在船上一些真率，悠恬的梦，到此破了，消失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当我们读到这里，不禁升起与作者身同感受的思情，倘想赴异国观光能愉快而尽兴，首要的是使自己的民族自立、祖国自强，这股强烈的改变现实、改造民族的深沉呼喊自然而然发自肺腑发自丹田。《游日杂记》还十分细腻而精采地刻画姐姐的形象，写出姐姐脸上流露的一种凄凉之色，于是以姊姊的口道出：“我们究竟是中国人”，“住在这时时想侵略人的国土里，心上总觉得有一种压迫”，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沟通起来，作品的思想得深化与升华。

（二）返朴归真，寄情山川，崇尚自然。是方令孺散文的一个重要内容。

她的散文，山水游记是其佳构精作，而且篇幅较长，尤以《琅琊山游记》为最。

由于对现实对压迫的忿恨，对污浊对浑沌的厌恶，对世俗对市器的逃遁，而自由自在纯净美好生活与精神的向往和涉猎，需要附丽与寄托，投向大自然是一种最好的调整与超越。她认为现

代的文明窒息了人的灵性,压抑了人的自由,于是忘情于山川之间,获得真善美的契合。

《琅琊山游记》写于 1936 年,其时方令孺沉疴虽有好转,但心情依照忧郁苦闷,应好友之邀而出游。文章起首便写出自己贪玩山水的因缘:

“我不会讲一句客气话,或是陪着客人,陪着尊长来几圈麻将应酬应酬。是的,对于这些事,我恐怕到死都不会,也不爱。我爱的是苍茫的郊野,嵯峨的高山,一片海啸的松林,一泓溪水。常常为发见一条涧水,一片石头,一座高崖,岩上长满了青藤,心中感动得叫起来,恨不得自己是一只鹿在乱石中狂奔。”

字里行间昂扬着醉心自然之万籁的激情,感染着我们。字里行间更体味出作者憎恶世俗而“贪玩山水”的深层意识。所以当她远离城市和沉闷生活东渡扶桑,在那水天相接、云烟氤氲、皓月照碧的海上时,她十分动情地写道:“大海把我的心放大放宽。”她把自己细腻感受和奇丽想象赋予景物以诗情画意,这可以看作作者美好心灵的折光,极富象征意味,所以在她描绘的景物中,我们时时窥见一位善良而纯净的人格在漫步。有

鉴于此,她的写景散文最具艺术魅力。

不仅如此,在她的游记散文中不止融和着作者本人,还溶解了时代与祖国的形象,1937年写的《在山阴道上》便是。它是方令孺后期散文的代表作,这虽然不是一篇纯粹的山川游记,但是对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景物,写得何等的色彩斑斓,明媚可人。作者在鲁迅先生作品的召引下,踏上“故乡”之途,作者笔蘸热情畅叙所见。文章最后激动地写道:“山川的壮丽和我心里正在思想的巨人形象,也融合在一起”,还引述了鲁迅先生《好的故事》中的理想美景,作者仿佛如鲁迅先生于猿年前朦胧中看见的“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昔日朦胧的理想终成如今清晰的现实,而且“永是生动,永是展开,以至于无穷。”江山依旧,景物全新,作者激情殷殷,赞美了时代的使然,读着此文,犹如春风拂面,心旷神怡,“就像是听孟德尔松的《春之歌》那样,觉得回肠荡气,令人神往。”(林非《怀念方令孺老师》)

(三)缅怀故友,缱绻情谊,活跃着一颗诚挚善良的爱心。这也是方令孺散文中的另一重要内

容。

方令孺自幼便缺少人间温暖,缺乏作为一个女孩子所渴求的爱,及长一颗纯洁的芳心未能得到爱的滋润与情的浇灌,她多么渴望与期待获得人间的友爱真情,视之为瑰宝。当她步入社会时,就广交友朋,用自己那颗真诚的心去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爱他们。这不仅体现在如对丁玲受国民党当局迫害之时,方令孺主动给予无私的帮助与慰安。这种纯洁善良的爱心更呈现在她的散文里,怀念与悼亡之作尤其动人,如《志摩是人人的朋友》、《悼玮德》、《青春常在》等篇什,虽然简短,但凝练而沉郁,真情厚谊跃然纸上,跳荡在字里行间,读来催人泪下。

方令孺生活中与其侄儿方玮德关系最为亲密,他是新月派年轻而富有才气的诗人,深受当时新诗坛鼎盛人物徐志摩的器重与赏识。方令孺由玮德而结识徐志摩,于是过从甚密,情谊甚笃。徐志摩正当才华焕发,成就日隆之时,不幸英年遇难,葬身蓝天,只活了猿远个春秋,文学生涯也仅只十年。噩耗传来,看重友爱尊重才干的方令孺怎能不悲恸与哀伤。这篇《志摩是人人的朋

友》悼文，虽没有摧肝断肠的率直抒怀，而是化作缕缕旧情往事的追叙。如写了他们几位友朋聚会中的戏言，而今竟成“讖语”，不禁令人嘘唏。这看似平常的巧合小事，不能简单地视为宿命论的悲叹，而是一种难以克制几近铭心刻骨的哀思与悼念。

这类文章都写得细腻入微而幽远深长。《悼玮德》尤其如此。玮德的早逝消息，对于方令孺绝不能接受，她的“发愣”，她的“不相信”，她仿佛仍然“听到他的足音，听到他活泼泼的推开门，唤一声九姑——听到他的笑，代表人类光明与春天的笑”，然而面对无可挽回的事实，只好转而为深深的祈祷与祝福。这种深沉与真挚的情谊，不仅体现于作者对于友朋亲人的爱心，而且更显示出作者的人格——纯净与善良的为人。痛悼挚友靳以的《青春常在》，缠绵地追忆二十余年并肩战斗的交往历程，真切写出逝者的纯真正直，真是“一腔真情，满纸是泪”。

（四）真心实意，热情欢呼新生活，无限热爱新时代。这是方令孺建国后散文创作的主旋律。

“大时代给我心有一种新的悸动，新的颤栗，

新的要求。”于是，上海刚解放，她便满怀激动写出《解放前后的一夕》，作者用鲜明的笔触，对比的手法，既揭露了国民党残兵溃败逃窜的狼狈相，同时又歌颂了为新时代新生活而战的人民战士入城时表现出来的高度革命性与严明纪律性。爱憎分明的叙述，颇为感人。文尾作者还按捺不住心底的欢笑，借一位老妇人之口说出：“我真高兴，我们中国到底有这一天。”继而又写了《一封家书》，又一次正面率直地道出这种惊喜与欢快之情，“这不是梦，是真真实实的好日子来了，我心里的快活，是有生以来所没有感到的，是这样的透明的快乐，没有一点渣滓。”真情实感充盈于文字之间，明朗而又自然。

从此，方令孺散文创作进入一个与前迥然有异的境界，热情奔放，情绪高亢，语言风格上也比前期更为健朗而质朴，而且题材获得拓宽，由自我命运的哀诉转为欢唱人民和祖国的美好。

从方令孺几十年的散文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作者一生都在追索着一种善良纯净的，充满真挚之爱的境界。这是一种诗的境界，也是一种道德、人生和社会的境界。因此，她诅咒黑

暗,追求自主;她欣赏、陶醉于自然之美中,获取真善;她缱绻于友谊,寄怀于真情;她赞美新的生活,依恋着祖国。她是一个纯洁的人,有着一颗质朴、纯净的心。她的散文正是十分精微地体现出她的这种人格。

三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鲁迅编)的“导言”中对现代散文艺术作了精辟论断:“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是“个人的发见”,也就是现代散文的第一个特征;第二是“个性的表现”;第三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不忘自然与社会”。

诚然,文学创作乃是个人独立的精神劳作,没有个人,没有个性,便没有真正的文学创作,作品应是作者审美经验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态。散文不仅概莫能外,而且尤其鲜明与直接。方令孺毕其一生,作品虽不多,但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特色,所以能够如同彗星横空,留下一抹光华,给人难以忘怀的印象。